

除了和睦相处,我们别无选择

[法] 皮埃尔·卡蓝默 (Pierre Calame)

杨 振 译

陈力川 校

为何要进行文化间对话?文化间对话这一词组中有两个关键词:对话和文化间。然而为什么要努力与那些和我们操不同语言,与我们有着不同价值体系的人进行对话?试图去了解,进而去理解他者的文化有何意义?答案随时代和情况不同而各异。

首先是对他者的陌生性感兴趣,他者的不同之处吸引了我们。如果说我们当代的博物馆起源于国王和贵族们的“古玩收藏室”,这倒并非偶然。所谓好奇,正是由与我们不同的、规范以外的事物来界定的,因为规范都是我们定的。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在这个醉心于国际旅游的时代,每个带着数码相机的人都会尽情地捕捉异域风情。今天仍然是这样,即使不承认也罢,许多文化间活动都起源于古玩收藏室的建立。

其次,文化间对话,或者更广泛地说,发现他者有一种“镜子效应”,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作为自我并不意味着可以认识自我。正是通过与他者的区分,孩子开始学会把自己与母亲以及周围的环境区别开来,开始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人。对成年人和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正是因为面对他者有自我界定的必要,也正是因为发现他者与自己是不同



卡蓝默先生

的,我才继续更好地理解自我。一切文化间对话都源自对相异性的认识和对普遍性以及人类共通性的发现这一双重运动。

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文化间对话的范畴。一切经验交流的意义都在于,在认识论层面,仅仅经历一种经验,不可能抓住该经验的特殊和普遍之处。只有在交流中才能逐渐发现各种文化的恒定性,反映出人类的统一性,发现为了生存和发展,每个社会都必须面临共同的挑战这一事实。

如果我们把文化间对话看做经验交流的一种变体,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第三个贡献:通过发现多元,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性,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社会所要面临的挑战的深层实质。

文化间对话的第四种类型源于相互依赖和关系。这一对话的产生并非由于认知的好奇,而是一种必要性使然。然而,在这一奠定社会间关系基础的总体类型内部,还要再区分出局部关系,如一直以来将每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关系,和那些产生于共同管理一种情境的必要性的关系。形象一点说,比如处理好同一楼层的邻里关系,主要为了能够和平共处,这与外交关系颇为相像,还有就是与其他房客共同对一套公寓进行管理这一关系。

跨国公司在文化间对话方面对于他们的职员,尤其是干部的信息极为了解,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与那些善于处理对外关系的外交家相比毫不逊色。然而外交家处理的是类似邻里关系的问题,而跨国公司职员管理的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

在这一文化间对话的类型学中,如何定位中欧关系?我们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次相遇来描述中西关系:文艺复兴时期耶稣会士来华;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与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还有就是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我们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间对话发生了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丝绸之路的存在证明了中西之间的交流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开始了。两种文明不停地互相影响。以前的这些关系属于前三种类型:对于彼此所代表的那个奇怪的世界充满好奇,在镜子效应下为加深相互理解展开的对话,还有经验和产品的交流。

19世纪,当西方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闯入邻家房屋时,即使事态发展不妙,双方也总还有退路,可以考虑以各自的方式打道回府。这与第三次相遇以及宏大的全球化运动不同。这次相遇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即市场和生产体系的统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仍然是可以推翻的,即使这样做会付出巨大代价,如20世纪90年代初苏维埃帝国的坍塌所显示的那样。

真正的全球化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之间的,不可逆转的相互依赖。一方

面因为各个社会会影响到生物圈的所有平衡——让我们想想臭氧层空洞或气候变化——同时也因为持续快速增长的信息流量将四海连为一体。于是我们发现了文化间对话的最后一种类型:出于共同治理世界的必要性而产生的对话。

据我所知,是米歇尔·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对话引起的后果作了总结,指出我们的星球就是我们的家园。这样,对话就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性,甚至是生存的必须性。正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房客们所说的那样:他们除了和睦相处别无选择。这个星球家园改变着对于普遍本身的定义,它也是脆弱的,正面临着威胁。我们都应该学做一个合格的一家之长,如今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我发现,90年代初,为了构建一个尽责、多元和协力的世界联盟,人们意识到在这个星球不同的社会间建立共同伦理基石的必要性。我们特别致力于宗教间的反思。我发现,传统上,宗教间的反思有意无意地都在寻找各种信仰和宗教实践变化莫测的形式背后普遍的真理。确实,在中西关系的复兴时期,一些神学家认为在中国文字中找到了原始的文字,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巴别塔建立之前是人类唯一的语言,而巴别塔的建立则象征着人类四分五裂,彼此不再能够理解,因为他们不再讲同一种语言。

对普遍性的这一追寻,我把它定义为理论普遍性。对理论普遍性的追寻逐渐从宗教领域转向科学领域,确立了自然科学相对于生态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权威地位。实验研究相对于临床研究也具有优越性,因为前者恰好回应了对时空中永恒不变的基本规律的探寻,这一研究在不同层面展开,代表了普遍秩序的理想。万有引力定律完美地象征着这一追寻的努力,它既适用于牛顿发现的那个苹果的掉落,也适用于行星和星系的运动。然而在伦理领域,我坚信,对于原初信仰的追寻是无意义的,或者至少说不是首要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共同治理星球这一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寻找共同的伦理基石称为寻找实际的普遍性。随着人类责任宪章的出台,它引导我们逐步将责任置于当代伦理的中心,原因很简单,责任具有这样一种伦理价值,它反映出人类在相互依存过程中所需要遵守的平衡原则。

我们的星球一旦变成了我们共同的家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比起“我”和“你”,“作为他者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你们”,“我们欧洲人”和“你们中国人”这些对立,“我们”变得更加重要。以至于每一次一种文化间的视野将某种文化视为认知的对象,它便有可能让我们远离目标而非靠近目标:因为我们一旦把他者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便会赋予其一种相异性,而忘却了首要问题是作为人类共同

体的我们,具有同样的命运,不论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就像同租一套房的房客一样,除了和睦相处,我们别无选择。

通过这一历程,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激发中欧论坛创意的动因,现在我要详细地谈谈此次论坛。它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发现,即不同社会之间在某一层面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属于以前国家的,这一层面主要包括外交、经济和高等教育关系,而这些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能够概括社会之间的关系总和。这些关系与文化间关系的第一种类型相对应。从这个角度看,16至20世纪之间民族国家的巩固固定了人们的思维,没有为未来做准备。对国家的巩固僵化了国家概念,使国家成为人类共同体的外延概念,提出统一性属于内部而相异性属于外部这一原则,它强化了“作为他者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你们”之间的对立。这比国界线更明显。如我们在非洲所观察到的,由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而产生的那些国界线,切割入社会内部,摧毁了游牧民族传统的行走路线,在边境处设置界限,为了所谓的国家统一,将近亲、操同一种语言、有着相同风俗习惯的种族强行割离。反常的是,这正是国家结构的巩固,政治学家们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这种国家观念认为,国家是共同体一致对外时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一切国界之外的东西必然是异质的。而这里的“对外”,是相对于所谓的内部一致性或者说强加的一致性而言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类概念还是个哲学概念。它之所以变成一个法律事实,仅仅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实施了种族大屠杀,产生了反人类罪的概念。如果说有反人类的罪恶存在,是因为人类成为法律的主体,成为法人,成为一种法律事实。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互依存的概念将我们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西的第三次相遇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类成为一个社会事实,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一个对于共同命运有着清醒意识的世界共同体。文化间问题彻底改变了本质。

今年春天中欧之间,尤其是中法之间发生的事情,如“巴黎奥运火炬事件”,对于我们创立中欧论坛,有着深刻的意义。几年来,我在中国和欧洲的工作、友谊和信任关系使我意识到:官方宣称中欧双方在外交、商贸和高等教育之间保持着极佳的关系,这掩盖了两个社会之间日渐加剧的互不理解。这绝不是说外交或商贸关系具有欺骗性。中国和欧洲是世界上拥护国际多边秩序的两个主体。它们是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交流学生的数量,尤其是近年来互访游客的数量惊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散居在欧洲,他们的社会作用显而易见。然而这一切却并不能阻止误解的产生。随着中国经济的逐年发展,中国在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眼中,象征着世界化对于那些最老牌的发达国家

所可能造成的生活模式的威胁,以及对于这些国家享有的特权的威胁,以前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他们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觊觎这些资源。在我和中国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多次交流中,我发现了一种逐年增长的民族主义情感,这其中有所谓重新找回的民族自尊心,这是好的,但同时也有另一种狂热的民族情绪和对外界的不信任感,我们自己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是很危险的。关系密切和相互误解这两者之间一点也不矛盾。正如一点火星可以烧毁一大片干草,年轻的中国残疾火炬手遭到一个甚至不是法国人的示威者的袭击,这件事被媒体一再放大,电视也大肆宣传,却没有任何媒体作出任何努力,让人们去理解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国政府赋予奥运火炬传递以一种象征价值,然而欧洲舆论却认为奥运早已失去了象征意义,这一误解的鸿沟使一桩小事变成了中法关系的象征。对于这一误解我曾作过很长的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是极具意义的:在那张著名的照片上我们可以发现两点问题:照片上唯一的法国人就是那个试图保护年轻运动员,阻止示威者行动的警察。画面上再没有其他法国人了,原因很简单,那天路上几乎没有巴黎人:火炬途经之处,警察戒备森严,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团结友好节日的反面形象,而友好团结正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想通过奥运火炬传递表达的一个意义。

今年春天在中国,我与许多人交谈,每个人都提到这件事。令人惊异的是,那些与我关系不错,而且颇有知识的人也说这样的话:“您认为法国人和法国热爱我们,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却发现他们并不爱我们,甚至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以前的法国人到哪里去了?看不到。”是什么一方面把中国人当做铁板一块,另一方面把法国人也当做铁板一块呢?不知道。或许是那种认为每个民族都步调一致集合在国旗下的意识形态。如果说一点小事就能造成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那么,当我们真正面临世界财富和原材料的重新分配时,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些好战分子,文化同一性观念的宣扬者,狂热追求区别的人,还有将一切事实都解读成国力较量的政治学家们将会推动国家利益之间的正面冲突,人们还会添油加醋地在这其中加上文化冲突话语,去说服我们的孩子们走上相互敌对的战场。因此在我看来,问题是严重而亟待解决的。这种历史情况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只能耐心地构建‘我们’,人们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将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对话作为世界不同社会间对话的典范和原型。

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这个论坛同时产生于偶然(然而是否有真正的偶然)和必然。

偶然的是,2005年,香港的大企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南沙

新城的创建者霍英东先生,想为自己一家新宾馆的开业举办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他找到了欧洲华人学会秘书长陈彦。后者发现,中国社会诸多领域对于欧洲建设的兴趣日渐增长。他考虑到我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不多,而且对于欧洲问题也有兴趣,于是便找到我们的基金会(FPH),想和我们共同策划这一事件。我立刻答应了,因为这正是我所归类的文化间对话的第二种类型。中国社会认为,欧洲建设的历史能够对其自身社会的建设有所启发,这么想自有它的道理。如果说中国社会自己得出结论,认为这一经验对它的发展有用,那么我作为一个欧洲人,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不会宣称说这种经验在文化上是不可移植的,我一向积极回应类似的要求。事实上,我在种种情境中多次发现,每个个体或是民族经常是变通着采用来自他者文化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对话,在于努力增强自信心。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不是邀请研究欧盟问题的专家学者到中国来——中国并不缺少这类学者——而是让那些真正参与欧洲建设的人,让那些愿意与中国分享他们切身经历的人去关心中国社会的期待。因为这也是文化间对话的一种维度,太多的沉思会冲淡它的效应,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对心灵、情感和时间的呼唤,而不是一味的分析。这也正是我们称之为“中欧论坛”的第一次会议的成功之处,我们在这个论坛前加了定冠词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还会有后来的中欧论坛。这个论坛经历了第一次变化,变成了社会间的自由对话,这些对话是通过两年一度在中国和欧洲轮流举行的一系列聚会来完成的。2006年10月,我在法国构思第二届论坛的时候,我意识到有必要把它办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对话。也就是在这次论坛时,必要性介入进来。我长期以来一直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有必要进行一场超越外交和商贸之外的对话。同时,我们有必要为这样的对话设置一种特殊的规格。常年来,在为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的话语范围内,我们试图促成国际公民间的对话,我们为此探究各种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些方法界定为两大社会文化间、行业间、多主题对话的方法,这些方法正是我想在中欧对话中运用的。

这里而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用词:谈到社会与社会的对话,似乎首先要界定我们让之进行对话的两个社会是怎样的。谁代表社会说话?谁能够合法地宣称自己是社会?人们经常把这个概念简化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事实上也被称之为社团世界,然而这只是社会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思考社会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基本问题,即承认一个社会内部的多元性和相异性。对话就是要将这一多元性展现出来,摒弃那种荒谬的普遍化倾向,即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欧洲人和欧洲文化”简单对立起来。一切文化都是多元的,而且

都是融会的。组织对话,也就意味着揭示一个社会表现形式的标准模式。90年代期间,我们通过三个多样性维度,来揭示社会表现形式的标准模式:地理文化多样性,这在中国和法国同样敏感;社会职业多样性;主题多样性。在两年一度的论坛第二次召开时,社会职业和主题多样性体现在会议大量的分组讨论上。会议共分46个组,19个是“社会职业”讨论组,27个是“主题”讨论组。地理多样性则表现在参会者来自中国不同地区和欧洲不同的成员国,这就避免了外交传统带来的“北京综合征”,按照这一传统,只有来自首都地区的人才具有进行国际对话的资质。将同一领域的人或是对同一主题感兴趣的人集中在各个讨论小组中,这种做法恰恰突出了每个讨论小组的统一性。再者,经验证明,不同大陆来的企业主管之间对话起来比较容易,农民之间也容易交流,只要会议提供语言翻译的媒介就行了。然而,大企业家和普通农民或失业者之间的鸿沟比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鸿沟要大得多,这就打乱了,或更确切地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组合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付诸行动的文化间交流的另一个必要性在于这是对话而不是陈述。我们经常忘记提及展开对话所需要的框架:它提倡对话在一些范围相对有限的团体间进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的话语权,对话是开放式的,而不是演讲和报告。事实上,各种对话,尤其是文化间对话,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自发地安排他们之间的事宜,将在彼处分离的事物在此处重新连接起来。通过进行一系列非指示性谈话,每个人都应该有可能构建属于自己的阅读和自己的经验结构,这些结构的碰撞通常比思想或数据的碰撞更能说明问题。

这就涉及了方法问题。于是另外一个哲学问题出现了: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它的合作伙伴能够将整个社会“召集”起来的合法性何在?这难道不是国家和政党的专利权吗?这个问题的提出常常反映出一种深刻的误解,或者说“合法性”一词深刻的双重性。一些人将这个短语理解为“合法的代表人”,即被法律法规所认可,能够代表他者说话的人。不过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这种合法性。我们所说的合法性来自组织文化间对话的意愿: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愿望,做法的恰当性,选择参与者的方式,主持会议的方法构成了这一合法性的基础。这种规模的公民行动在哲学和政治层面上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历史不定性意识。事实上,历史并不是事先写就的,并不是说我们只要读几页书,就能了解历史。诚然,政治或经济决策者们可以撰写、发明,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然而历史的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是情感的演变,是意愿的表达,是无数人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权力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建构的。正如大哲学家保尔·利科所说:“当人们联合

起来时,权力便被创造出来,而当人们分散时,权力便会消失。”

正如一切付诸行动的大型活动一样,第二届中欧论坛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筹备时间短暂得可怜,只有9个月。不过,召开论坛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呈现出全新的特色。不论是中方还是欧方,包括那些本想从社会间对话中看出不正当竞争的机构,都对此次对话和它的追求感兴趣。这一点显示了外交和经济界人士承认外交和经济关系在构建相互理解过程中的无能。

除了论坛上46个讨论小组和所有参加者共同参与的大会所讨论的议题外,还有一个与多样性和统一性有关的新问题。从如此众多的讨论小组讨论的结果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共同的结论,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就是承认我们有必要为这一过程制定一个统一性和共同视野的原则。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讨论这一问题,不过我们用来重新归纳各讨论小组成果的“关联图表”法,目的正在于考察这一多元性中是否有一些统一性因素存在,这一多元性涵盖了欧洲和中国两个方面。这种方法规定,在每一个从中欧两种视野出发去考察的个案中,我们要能够从各讨论小组众多的讨论结果中总结出少数几条战略中心。我们总结出的四条针对欧洲的战略中心和四条针对中国的战略中心就是从这个方法论本身得来的。而在这次双年会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果:欧洲和中国的四条战略中心,即两个社会所面临的四大挑战,是相同的,它们所占有的分量也很近似。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关系到民主的本质。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弱点之一是造成了所谓的多数人专制,或者用游戏中的术语来说,这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游戏。只要有51%的选票支持你,你便拥有了制定国家政策的绝对领导权,但这些政策不是用在51%而是100%的民众身上。这一专制深深地植根于习俗中,以至于民主就变成了对立性辩论、选举和专制。然而从词源学角度来说,民主这个词的意义要宽广和丰富得多:即准备充分的条件,让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每个公民都有发言权,都能够为创建共同的未来作出贡献。如今民主所需要的是辩论的过程——因为辩论的主要优点是帮助想象现实——通过辩论,可以在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内达成一致,因为辩论考虑到了这个社会最多元的利益。因此,在一个民主过程之后,即在考虑到一方和另一方所言说的整体之后,如果我们发现两个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惊人的相似,文化间对话的意义就改变了,它就变成了每种各具特性的文化为应对共同的挑战而作出的贡献。正如我们所见,我们远非要彰显区别,而这种彰显在文化间专家那里很常见,对于他们来说,通俗地讲,这是“商业招牌”。在这里,我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用几个词描述一下这四种共同的挑战,至于更为细致的分析,可以

参见中欧论坛的网站。第一条可以称为“和谐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第二条是“价值、开放和同一性”,第三条是“参与和综合治理”,第四条是“合作与世界治理”。

作为总结,同时也和我开始的讲话接头,我们可以说,第二届中欧论坛显示了文化间对话的四个优点:承认每个社会内部的多元性;解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镜子效应,即每个社会有必要借助于对他者进行倾诉,来体识自身;发现新的推理模式,发现可以丰富思想的新经验,发现各种可以考虑的解决办法;最后还有以民主的方式识别共同的挑战,它们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

第二届论坛的成功再一次引发了论坛实质的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雄心:创造两个社会间进行持续对话的空间。这是我们需要共同书写的崭新的一页。